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tate-Building



中国共产党与 国家建设

林尚立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tate-Building

本书立足政治学理论，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讨论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价值与意义，二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基本战略，三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和发展的方略。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内在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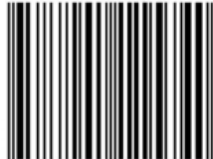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二维码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二维码

上架建议：中国政治

ISBN 978-7-201-11574-0



9 787201 115740 >

定价：79.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 林尚立著. -- 2 版.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01-11574-0

I. ①中…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关系—国家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21②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209 号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GUOJIAJIANSH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 琤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4月第2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001 / 引论

017 / 第一章 以政党为主轴的现代国家建设

- 一、高度秩序化的帝国体系崩解 19
- 二、政党支撑国家现代转型 24
- 三、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逻辑 28
- 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32
- 五、党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框架 35

039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一、党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探索 41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中国发展 50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问题 54
- 四、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4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党建战略 66

071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

- 一、现代国家制度的政治规定性 73
- 二、中国共产党自主建构中国国家制度 77
- 三、政治发展与国家制度建设 80
- 四、中国国家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 85

091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民主建设

- 一、人民民主是国家建设的民主形态 93
- 二、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民主 97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有序发展 102
- 四、协商民主有效实践人民民主 107
- 五、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 111
- 六、区别一般民主的党内民主边界 117

123 / 第五章 党的统一战线与国家建设

- 一、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与国家整合 125
- 二、党领导国家整合的法宝与机制 129
- 三、统一战线建设人民团结的社会 134
- 四、统一战线协调多样性与一致性 138
- 五、党以统战逻辑建设国家的战略 141

151 / 第六章 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权力网络

- 一、整合国家的权力组织网络 153
- 二、权力组织网络与党的领导 156
- 三、党的集权与以党代政 160
- 四、中央集权与党的中央集权 168
- 五、分权及其运动逻辑 176
- 六、权力组织网络与权力关系变迁 181

187 / 第七章 党整合社会的轴心与结构

- 一、中心支柱与轴心体系 189
- 二、从轴心到外围的向心性整合 193
- 三、外围组织反向发展与同构性整合 198
- 四、轴心与外围互动的认同性整合 201
- 五、从组织化社会到社会组织化 206

215 / 第八章 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现实基础

一、社会主义与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 217

二、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政治基础 220

三、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制度基础 222

四、政治整合与党领导的社会基础 225

231 / 第九章 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执政体系

一、执政与领导的政治逻辑 233

二、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构 235

三、执政党执政的功能体系 236

四、执政党执政的资源体系 238

五、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实现方式 241

六、党提高执政能力的战略体系 243

247 / 第十章 党的建设推动国家建设

一、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础与使命 249

二、系统强化执政为民能力建设 251

三、健全党政关系的制度安排 258

四、制度建设整合党建全局 263

五、党内民主推动党和国家制度化 267

271 / 第十一章 基层组织与党的执政资源

一、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战略资源 273

二、组织创新提升党的先进性与执政力 276

三、基层党组织建设两大行动空间 279

四、社区党建与基层群众自治互动发展 283

289 / 附录

327 / 参考文献

337 / 后记

► 引 论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塑造,但从根本上讲,人的发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出现,正是人的发展的结果。人的自主和独立的实现,使人类历史从传统跃进到现代,并开启了现代化历程。自主与独立,赋予人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人无限的创造力,以至于使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一种无限的可能。自主与独立,是人的发展的质的飞跃,所以现代化发展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发展来说,也是质的飞跃。自主独立个体创造了现代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形成了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并由此创立了与传统邦国或帝国完全不同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确立和成长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相关,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任何试图迈向现代化的社会,都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现代国家,使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有效成长的历史任务。国家成长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要求任何领导和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都必须有能力推动现代国家的成长。

中国是在试图用现代国家要素改造传统帝国的努力中迈入近代的。虽然这个努力没有成功,但传统帝国的崩解还是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前提。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也由此开启,至今已逾一个世纪。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核心角色,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历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既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因此,要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就不能不把握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成长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中国现代政党萌芽于帝国体制危机之中,但其真正的确立和成长却是在帝国体制崩解之后。^① 共和的出现为现代政党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中国的历史逻辑表明,在帝国体系走向崩解,现代国家体系得以诞生这样的历史交替过程中,相当稚嫩的现代政党虽然是其中的活跃角色,但不是决定力量。传统帝国体系是在内外交困之中走向崩解的,共和随之取而代之。换句话说,现代共和对传统专制的替代,是以传统帝国与帝制的崩解而实现的,不是现代共和卓有成效地发展的结果。于是,在中国,以共和形式确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在其诞生之后,就面临着如何有效成长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依然在经济与社会形态上处于前现代的社会来说,其现代国家的成长须臾离不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中国要进行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争得主权,以摆脱帝国列强,然后统一政权,以消除军阀割据。主权的获得和政权的统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革命,就是武装斗争。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结束帝制,推倒帝国。虽然共和因帝制的终结而开启,但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不因帝国的推翻而确立。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共和要在中国最终确立,需要解决民族、民权与民生问题,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非要进行革命不可,而这种革命要取得最终的成功,非要现代政党与军队不可。^② 为了扭转辛亥革命之后国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退步,并日益陷入亡国危境的局面,孙中山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导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设黄埔军校,实施北伐。

用政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来进行中国革命,并由此支撑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是孙中山革命实践的总结,是其在各种失败和教训中感悟出来的真理。这个中国革命先行者所昭示的真理,并没有被国民党所真正继承,

^① 参见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

^② 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前后的一系列论述中都不断地在阐述这些基本问题。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37~615页。

相反却在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辛亥革命之后,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成长而诞生的;而诞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力图承载起推动国家成长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要成为国家成长使命的承担者,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中国国家成长的中心支柱。为此,必须进行三方面的努力:首先,必须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其次,必须拥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为关键的是党必须建立人民武装,并领导人民武装进行人民战争;最后,必须以党为核心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在塑造党的中心地位和提升党的中心支柱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获得整合和统一。这三方面的努力,毛泽东概括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①中国共产党借助这三大法宝,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中心支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成长的逻辑也就从革命的逻辑转向了建设和发展的逻辑。在革命的逻辑下,国家成长关注主权的确立与政权的统一;在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下,国家成长关注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正如在革命逻辑下的国家成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样,在建设和发展逻辑下的国家成长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种领导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开始现代化发展的,这种现代化必定要借助有效的核心力量,来支撑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必定要借助有效的领导力量,来整合资源、规划全局、把握机遇、创造合力,以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可见,当中国迈入现代化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成长对有效政党的需求是内在的。这种需求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应这种需求,成功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主权独立国家,并由此开始在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614页。

虽然并不完全是现代政党导致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诞生,但是现代国家诞生之后所孕育出来的政党,却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决定力量。换句话说,中国迈入现代国家成长的时代,虽然不是政党直接推动的结果,但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却完全依赖于政党的领导与支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是现代国家的建设主体。就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确立来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而且也是缔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是政党领导人民缔造和建设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充分决定了政党在国家成长中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所以,考察中国的国家成长,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政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反,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作用,并仔细把握其中的关系和逻辑。否则,我们对中国国家成长之道的把握永远触及不到根本。

二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民族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但对其所要建立的国家的构想,则是在不断思考 and 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时所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新社会的主张,而对于建设“新国家”并没有清晰的概念。然而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建设一个新国家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思考了。蔡和森认为,到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党才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①。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第一份建国构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表达的建国构想。具体内容是: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④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⑤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⑥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

^① 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的绝对自由;⑦制定关于工人农民以及妇女的法律。①显然,这个时候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后来的国家建设实践有相当大的差别,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最初的建国构想是联邦制,而后来的建国实践是单一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最初构想国家建设的时候,虽然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但其理念更多地是从革命的理想追求和苏俄的经验出发的。在此后的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未来的国家建设构想提出新的主张,直到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建构未来国家的构想。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国家建设作为革命的预期目标和成果而独立于革命的进程,而是与革命进程相统一,强调革命的过程与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在中国是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经过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武装起义后可以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②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中国共产党把建设革命政权看作是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革命的武装斗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此前没有建立政权的直接经验,为了能够有效地推进革命政权的建设,所以党的六大决定全面推广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起义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③将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有机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农村开辟出一个又一个革命根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16页。

② 同上,第390~391页。

③ 同上,第391页。

根据地。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拥有一支兵力达十几万的红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构想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根据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另外,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条例法令。^①由于中国共产党毕竟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所以这些条例法令与其说是建立国家的条例法令,不如说是建立革命政权体系和革命根据地的法律条例,它针对的不是未来国家建设,而是现实的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但是对于后来的国家建设来说,由此开始的政权建设实践却是党领导国家建设行动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也就自然放弃了党的二大提出的用联邦制建构未来中国的构想,但没有因此动摇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追求。

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农革命政权,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名副其实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临时中央政府力图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使命。在为这个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上升为领导全国斗争的政党,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党。为了更好地凝聚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政权建设,同时调整国家建设的取向,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

^① 参见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①这个变化为此后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其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国家的构想:“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这个新国家建设中,毛泽东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建设框架,并对每一个领域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取向。其中就新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②这个建国方向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国家建设实践,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个建国方向上确立起来的,并得到有效发展。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颁布的宪法和1982年颁布的宪法,都坚持在这个方向上规范国家制度,促进国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并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所取代。但是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判断失误,加上没有很好地解决现代化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② 同上,第663、677页。

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所以新的建国实践框架对过去的实践框架的取代并不彻底,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建设的努力既不能完全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困扰,也不能从不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中获得有效支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革命后的国家建设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中国发展的规律来全面把握中国的国家建设,使国家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呼应,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贴近,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相衔接,从而为新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并伴随着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的成长,以个体自主独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开始出现,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不仅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的结构发展为“四位一体”的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①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个总体布局发展为“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制度条件和发展动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巩固和发展。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次清晰描述了中国未来的国家景象:“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①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未来发展景象的追求进一步深化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清晰地描述中国未来国家的景象,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分不开的,其背后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希望和期待、奋斗与心血,同时也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的中国。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是中国国家成长的重要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这是中国国家成长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依然决定着中国国家成长的未来。

三

这样的国家成长形态,显然不是人为预设的,而是中国国家成长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所决定的。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成长与其他社会的国家成长不尽相同,它有自身的特点和逻辑,也有自身的路径与进程。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之后,任何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都必然要把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使命。由于各自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社会完成这个使命的出发点、动力结构、进程逻辑以及发展速度自然不同。因而,不存在不同国家成长形态之间的优劣问题,关键看其是否有效、是否能够保持国家成长的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成长的基本形态应该说是有效的形态。这个判断不仅来自中国国家成长所展现出来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来自这个形态给中国国家成长提供的具有长远效应的动力资源。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资源不是所有国家成长都可能获得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一条比较成熟的发展道路。尽管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